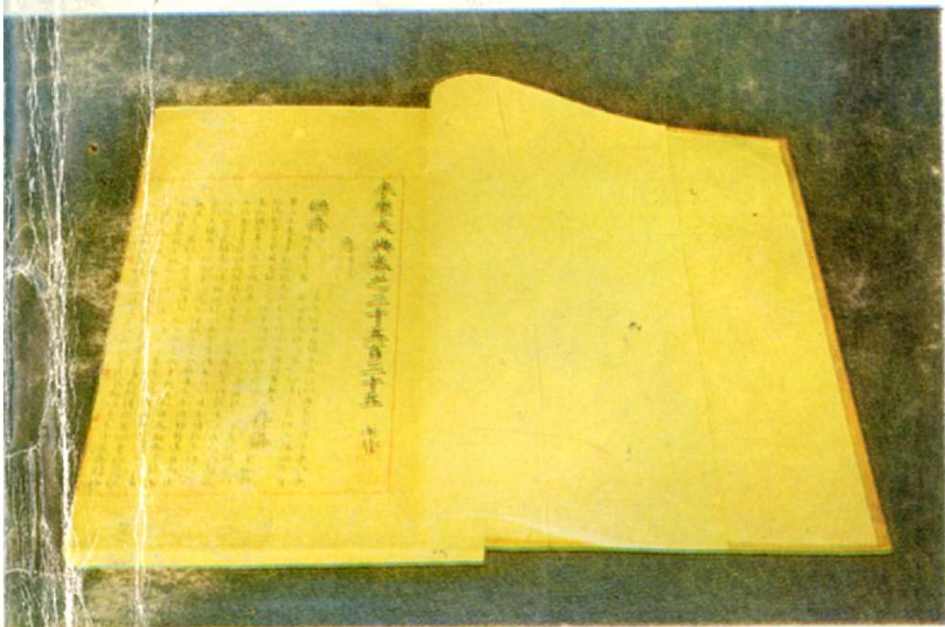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志编纂委员会

100301

北京出版史志



清以前北京翻译图书出版举要

北京古代出版机构考述(中)

软科学图书在北京地区的崛起

对北京出版社选题管理的片断回忆

《高山下的花环》的组稿编辑情况

《创业史》出版的前前后后

第10辑

北京出版社

BEIJING CHUBAN SHIZHI



校 雉 俑

目 录

北京出版史志

第 10 辑

-
- 清以前北京翻译图书出版举要…… 爱新觉罗·常林(1)
北京古代出版机构考述(中)…… 宋平生(40)
-

· 京华出版苑 ·

- 民国时期京版的社会学图书…… 邱崇丙 武永明(69)
建国后京版的应用技术图书(1949—1989年)
…… 朱大南(76)
建国后京版的环境保护图书综述…… 明 哲(97)
建国以来北京出版的年鉴…… 邱子钊 邱一光(108)
软科学图书在北京地区的崛起…… 赵良珍(113)
-

· 编辑工作 ·

- 对北京出版社选题管理的片断回忆…… 陆元炽(138)
从《战争启示录》的出版谈起…… 吴光华(148)
突出北京特色 坚持出精品…… 张肇基(153)
《高山下的花环》的组稿、编辑情况 …… 张守仁(157)
《创业史》出版的前前后后…… 王维龄(160)
-

· 燕京出版史事 ·

《中国社会科学名家学术论著自选集》

的出版…………… 胡乃羽(168)

· 电子出版 ·

北京地区电子出版单位与电子出版物掠影

…………… 田 耕(172)

· 音像市场 ·

北京法制教育音像出版社音像制品概况…… 钟 威(181)

· 印刷记略 ·

印刷业管理大事

记略(1949—1993年)…………… 高永勤(183)

· 资料 ·

国学释名 (68) 方志的源流 (107) 清末北京戏曲抄
本租赁业 (112) 善本书 (137) 排字“宋体”成于明
(147) 同文书局 (156) 建国初期出版社的编辑审订制度
(167) 方志的种类 (182) 书肆 (193)

清以前北京翻译

图书出版举要

爱新觉罗·常林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故早在我国远古文献中便有了关于翻译的记载。后来因汉族人口增多，汉语言文字逐渐成为通用的语言文字，但由于各民族之间的语言与文化交往一直比较频繁，翻译在各朝各代仍是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如《周礼·秋官司寇》中记载有：“掌蛮狄诸国传谕言辞”，“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即周代以与南蛮交往为主，故多称翻译为“象”，从事翻译的官员为“象胥”。《礼记·王制》亦载：“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也就是说，古时对能理解东西南北各少数民族或外国民族语音的翻译人员，分别称之为“寄”、“狄鞮”、“象”、“译”。到了汉代，与北狄的交往日益频繁，故“译”逐渐通行。自东汉始，随着佛教盛传而大量译刻佛经，“翻译”一词开始兴起，一直沿用至今。^①

根据有关专家研究，我国古代早期的翻译多为口译，因当时的国内少数民族和邻国，都还未发明自己的文字。大规模地翻译外国文字资料，是从汉代翻译佛经开始的。在历史上，幽燕地区从来就是各民族互相融合的地域。因此自秦汉始，北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中原日益密切，成为少数民族与中原交往的门户。故对北京古代翻译图书出版的研究，无疑

是北京出版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下面分辽、金、元、明、清分别述之。

一、辽代

后晋天福三年（938年），晋遣使节对契丹奉表称臣，并献燕云十六州图籍，燕云十六州归契丹统治。不久，辽升幽州为南京，又称燕京（今北京），自此燕京成为辽代的陪都之一，契丹人大量迁入，此后宋辽在此战争不断。文化一向不很发达的契丹人在以战争手段掠夺财富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搜求中原的文化典籍。如辽灭后晋时，便“取晋国图书、礼器北上。”即使是在漫长的和平时期，羡慕汉文化的有识之士仍冲破重重关禁，求购图书。如辽东丹王耶律倍“令人赍金宝私入幽州市书，载以自随，凡数万卷”。得到这些图书后，便选择一些急需或非常有价值的加以翻译。东丹王耶律倍还曾翻译过《阴符经》，这是一部融合易老阴阳法兵诸家思想学说，谈论兵法权谋的著作。^②

契丹初无文字，刻木记事。太祖神册五年（920年）制字数千，名契丹大字，由耶律庶成创制。六年后太祖弟迭剌从回鹘使者二旬，能习其言与书。辽圣宗耶律隆绪（982—1031年）爱好汉文化，在位49年，为辽全盛时期，曾以契丹大字亲译白居易《讽谏集》，并诏诸臣读之。另有辽兴宗重熙年间，学者萧韩家奴译《五代史》、《贞观政要》、《通历》等，萧韩家奴字休坚，涅刺部人，通契丹文、汉文。曾预修《辽实录》、《礼书》，著有《六义集》。此外还有耶律庶成译《方脉书》。可惜这些译本一本未传。^③

辽代中后期，由于契丹人汉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图书的翻译、出版工作也呈现出繁荣景象。

辽代统治者崇尚佛教，如辽道宗耶律洪基（1055—1095

年)便好佛,通梵文,精华严宗,能亲讲佛经。因此辽代在刻印大藏经和其它藏经的过程中,燕京僧人和从辽境以外来的僧人不仅对历史上已经翻译的经文进行校勘,而且进行了新译。

1974年起陆续在山西应县释迦塔内发现的辽时文献,有很多为佛学译著。另有朱子方先生在《辽代佛学著译考》一文中考证有慈贤(僧人,中天竺摩竭陀国人,入契丹而为国师)译经10种:

- 《妙吉祥平等瑜珈秘密观身成佛仪轨》1卷;
- 《妙吉祥平等秘密最上观门大教王经》5卷;
- 《妙吉祥平等观门大教王经略出护摩仪轨》1卷;
- 《佛说如意轮莲花心如来修行观门仪》1卷;
- 《金刚摧碎陀罗尼》1卷;
- 《大随求陀罗尼》1卷;
- 《一切如来白伞盖大佛顶陀罗尼》1卷;
- 《大悲陀罗尼》1卷;
- 《佛顶尊胜陀罗尼》1卷;
- 《梵本般若波罗密多心经》1卷。

其中见于前人著录的为前五种,《频伽藏》、日本《大正藏》收有全文。后5种为在房山石经中的新发现。^{④⑤}

二、金代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于公元1115年在我国北方建立了封建的金朝,后海陵王完颜亮于公元1153年定都中都(今北京)。女真人建国后,在官制、营建都城、营建宫室、礼仪等方面模仿中原汉族制度,学习中原文化,任用汉人,使得出版事业有了很大发展。金初没有文字,太祖阿骨打时完颜希尹仿汉人楷书及契丹字而作大字,金熙宗时又创制小字,两者通用。

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四月,推行汉字,令自今日

始女真字直译为汉字，将国史院专写契丹字学者辞退。是月，学士院新进唐代杜甫、韩愈、刘禹锡、杜牧、贾岛、王建，宋代王禹偁、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张耒、秦观等女真字译集26部。^⑥

金代统治者较好的继承了儒家思想，为了更好的传布，金世宗时就曾令徒单镒等以女真字翻译各种儒家经典，当时还在中央设立了专门的译书机构——译经所，译经所的工作卓有成效，用女真字翻译了不少汉籍中的经、史、子书，并奉旨颁行。

自金皇统元年（1141年）熙宗亲祭孔庙，提倡尊孔，使得汉风渐染，故俗渐失。金世宗定都燕京之后，其风更甚，金统治者深以为患。于是开始禁止女真人改为汉姓，学穿汉人装束。勒令卫士学习女真语。并于大定四年，诏以女真字译书籍，五年，翰林侍讲学士徒单子温译进《贞观政要》、《白氏策林》等书，大定六年，徒单子温译进《史记》、《西汉书》等，并下诏颁行。^⑦

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八月乙未，金世宗观稼于东郊，以女真文《孝经》千部赐护卫亲军。九月，金世宗又命颁行所译《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杨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等，其目的是“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⑧且金代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也都采用了徒单镒与译经所所译的诸书。^⑨如《金史·选举志》中记载：“自大定四年，以女真大小字译经书，颁行之。正隆元年，命以五经三史内出题，始定为三年一辟。”“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谕宰臣曰：‘女真进惟试以策，行之既久，人能预备，今若试以经义可乎？’宰臣对曰：‘《五经》中《书》、《易》、《春秋》已译之矣，俟《诗》、《礼》毕，试之可也。’”^⑩这些或由女真国子监刊印，或由弘文院刊行于世。

金代中央除国子监专司教育并刻书外，弘文院、秘书监、史馆等机构也曾刻书。据《金史·章宗纪》载：“五年（1194年）置弘文院译写经书”。《金史·百官志》也载：“弘文院知院，从五品；同知弘文院事，从六品；校理正八品。掌校译经史。”可见弘文院也奉命刊行翻译女真文书籍。

由于金宋时常处于交战状态，因此金朝也曾大量译介中原军事典籍，其大部分军事译著是由汉文译成女真文的。据《补元史艺文志》记载：“有女真字太公书、女真字伍子胥书、女真字孙臆书、女真字黄氏书等。”太公书即《六韬》，亦称《太公六韬》，为著名的《武经七书》之一，系战国末年人伪托周开国元勋姜太公所著。伍子胥书，《汉书·艺文志》有《伍子胥十篇图》一卷，今不存。孙臆书为《孙臆兵法》，疑为《孙子兵法》。从金代武举必考“孙吴书十条”的记载看，《孙子兵法》与《吴子》皆有女真文译本。黄氏书，即《黄石公三略》，亦《武经七书》之一，据考证为东汉年间人伪托汉初授书张良的黄石老人所著。^⑩

明代正统（1436—1449年）时杨士奇编明内府藏书目录——《文渊阁书目》中著录有女真字《盘古书》、《孔夫子书》、《姜太公书》、《孙臆书》、《百家姓》等18种通俗读物，也为译刻。^⑪

三、元 代

蒙古成吉思汗十年（1215年）五月，蒙古军队破金中都，不久改中都为燕京，又为燕京路，总管大兴府。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继承皇位，进一步重视儒家文化。至元元年（1264年）二月，世祖为加紧总结历史经验，探求治国之道，遂“敕选儒士编修国史，译写经书，起馆舍，给俸以贍之。”

元初无文字，成吉思汗时采用畏吾儿文书写蒙古语。蒙建国后，忽必烈令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至元七年而成，虽新文字有别于畏吾儿文字，但畏吾儿文字对蒙古人习以为常，故畏吾儿文和蒙文为蒙古人所通用，译刻图书也主要使用这两种文字。

元代译刻图书的机构主要有兴文署和艺术文监。

兴文署是元中央政府的藏书、刻书机构。初建与元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年），“置令丞并校理四员，厚给禄廩，召集良工，刻诸经、子、史版本，流布天下，以《资治通鉴》为起端之首。”先后隶属于秘书监，翰林院、集贤院等。其间兴废无常，至元二十七年正月复立。由于当时蒙古统治者急于借鉴历史经验教训，便使用他们比较熟悉的蒙古、畏吾儿字刻印《资治通鉴》。据明《元史纪事本末》卷18载：“至元十九年夏四月己酉，刊行蒙古、畏吾儿字所书《通鉴》。”

元代与图书有关的艺术文监设立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下辖艺林库和广成局，前者主要负责管理中央政府的藏书，后者则掌管汉文书籍（以儒家经典为主）的蒙古文翻译、校勘和刻印工作，《元史·百官志》卷88称：“专以国语敷译儒书”。广成局与艺术文监同年设立，“设大使一员，从七品；副使一员，正八品；直长二人，正九品。司吏二人。”^⑭据《元史》载，当时译有《尚书》、《孝经》（孛罗铁木儿译，大德十一年刊）、《图像孝经》（至正四年刊）、《忠经》、《大学衍义》（王约等节译，仁宗时刊）、《通鉴节要》、《帝范》（唐太宗撰，察罕译）、《贞观政要》（至正四年刊）、《图像列女传》（至正四年刊）、《皇图大训》（天历中译）及《百家姓》、《千字文》等书，有的大量赐给百官。^⑮

医书方面，《难经》、《本草》亦有蒙文译本。^⑯

元代最大的印刷工程，是补刻或新刻汉、蒙、藏、西夏文

的大藏经，特别是西夏文和藏文大藏经是由宣政院负责的。^⑥如史载，元大德六年（1302年），杭州路大万寿寺奉敕雕造有河西字大藏3620卷，即为西夏文《大藏经》。

元代统治者素信神灵，当他们接触了藏传佛教以后，便以藏传佛教作为主要信仰对象。为了扩大藏传佛教的影响，元统治者召集大批译师、工匠将藏文佛经译成蒙文、畏吾儿文，以推动藏传佛教的传播与发展。这一活动就在大都城中的大圣寿万安寺（今阜成门内白塔寺）内进行的。据中央民族学院珍藏的《入菩提行论疏》蒙文刻本曰：“将《入菩提行论疏》于大都白塔寺雕版印行一千份；皇庆元年。”又《柏林吐鲁番蒙古文收集品》中，一份1312年的佛教印刷品残件上记载：“余受合罕之命，于鼠儿年夏月第一日初一日，于大都白塔寺内刻此……经注，印行千册，以传众生。”

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畏吾儿文佛经《变神作品的题记》残本中也有佐证：“……这次翻译最优秀的作品的工作由迦鲁纳答思圆满而无遗漏地实施并完成了，翻译地点在大都精美奇妙的白塔寺中进行，时间是吉祥的虎年、十干之壬年，七月。善哉！善哉！”这篇题记不仅告知译印佛经的地点外，还告知了具体的译师是迦鲁纳答思。迦鲁纳答思为元代著名译师，《元史》中有其传：“畏吾儿人，通天竺教及诸国语，翰林学士承旨安藏扎牙答思荐于世祖，召入朝，命与国师讲法。国师西番人言语不相通。以畏吾儿字译西天、西番经论。既成，进其书，帝命钹版，赐诸王大臣。西南小国星哈刺的威来朝，迦鲁纳答思于帝师前敷奏其表章，诸国惊服。”可见当时译刻佛经与翻译贡献之大。^⑦

元代各地刻书需由中央政府批准，据明代陆容《菽园杂记》载：“元人刻书，必经中书省看过，下所司，乃许刻印。”故在泰定二年（1325年）由国师亦璘真吃刺思刻印的《新唐

书)、《资治通鉴》藏文译本(后被西藏的古史《红册》所引用),也可视作京版。蒙古文《百家姓》这类初级课本,当时发行量很大,现在元本《事林广记》中可以看到《蒙古对照百家姓》。史书载清人曾藏有元刊蒙古文《孝经》一本。北京图书馆现藏有元刊《蒙古畏吾儿字于汉字对译孝经》可供今日了解当时译刻图书情况。^⑧

元代全盛时期,元大都作为国际性大都市,聚集着许多罗马教皇的使臣、印度的僧侣、东罗马和阿美尼亚的商贾,还有许多巴黎、意大利的艺人,阿拉伯各国官吏及波斯、印度的历算家。元朝皇帝在大都实行对外文化开放政策,甚至还允许外国人在衙署里做官。外国的科学家、医生和传教士等成批来到大都,中国的学者、官员和僧侣等也从大都前往世界各地。随着大批色目人的迁入,中亚的医学、天文学、数学、音乐和舞蹈及各种精湛的手工技术、科学仪器都先后传到大都。如景教徒爱薛、弗林(东罗马人),忽必烈令掌星历、医药二司。据《元史》记载:“至元四年(1267年)西域札马鲁丁撰进万年历,世祖颁行之”,即为翻译回回(阿拉伯)万年历,由忽必烈下令颁行。元政府中专门设有回回司天台,以札马鲁丁为提点,后兼知秘书监事,“掌观象衍历”。至元十年(1273年)北司天台统计其所用的回回书籍共240部,大都是关于天文历算、仪器制造、医学的著作。这些书籍后都归秘书监收藏。

据元王士点、商企翁《秘书监志》卷7《回回书籍》,当时有以下几种天文、数学方面的翻译书籍,曾供元代天文学家修历时参考:

《麦者思的造司天仪式》(即托勒密《行星体系》的阿拉伯文节译本)^⑨;

《集尺》(译音,意为天文历表);

《四擎算法段数》(兀忽列著)15部;

《罕里速窟允解算法段目》3部；

《撒唯那罕答昔牙诸般算法段目并仪式》17部；

《呵些必牙诸般算法》8部。

“兀忽列”疑为“欧几里得”，“罕答昔牙”意为“几何学”。但都已失传。

元代大臣赡思（1278—1351年）为阿拉伯人，是元好问的再传弟子，著述甚丰，曾撰有《西域异人传》和《西国图经》，有人推断他是根据阿拉伯有关书籍编译而成的。另有李泽民和清浚和尚，曾共同绘制过世界地图。不仅准确的描绘了欧洲、非洲、地中海沿岸的形状，以及大西洋中的亚速尔群岛，并且标明了包括德国、法国在内的近百个欧洲地名和35个非洲地名，有些还标出了相当准确的译音。鉴于他们二人从未离开过中国，而且当时中国的地理测绘技术比较落后，可以推测他们至少是参考了某些翻译的地理学资料。这些资料的翻译或获得，在元大都极为方便。

此外元末还译成医学书籍《回回药方》一书，在明初刊刻。此书即是中世纪医学巨擘阿拉伯医学家伊本·西拿所著《医典》的译本。^{②③}

作为各文种翻译的一个特例，在北京昌平县居庸关中，有一建于元至正二年（1342年）的云台，在云台东西壁上，刻有汉文、梵文、藏文、维吾尔文、八思巴文、西夏文六种文字书写的佛教经咒，这几种文字为元代刻印文献常用之文字。

以下为一些史料中记载的元代翻译图书的出版情况：

大德十一年（1307年）八月，中书左丞李罗铁木儿以国字译进《孝经》，成宗皇帝命中书省刻版摹印，诸王以下皆赐之；

至大四年（1311年）六月，武宗览《贞观政要》，谕翰林侍讲阿林铁木儿：“此书有益于国家，其译以国语刊行，俾蒙

古、色目人诵习之。”

延佑元年（1314），仁宗以《资治通鉴》载前代兴亡治乱，命集贤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及李孟择其切要者译写以进；

延佑四年（1317），翰林学士承旨忽都鲁都儿迷失、刘赛等译《大学衍义》以进，仁宗览之，谓群臣曰：“《大学衍义》议论甚嘉，其令翰林学士阿怜铁木儿译以国语”；

延佑七年（1320年），翰林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译进宋真德秀著《大学衍义》，英宗遂以印本颁赐群臣；

泰定元年（1324年）正月，敕译《列圣制诏》及《大元通制》，刊本赐百官；

至顺二年（1331年）四月，文宗命以泥金印畏吾儿字书《无量寿佛经》1000部；

至顺三年（1332年）四月，命奎章阁学士院以国字译《贞观政要》，钹板模印，以赐百官。

四、明 代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二日，明大将徐达攻入大都，封府库图籍，元朝灭亡。不久改大都路为北平府。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从此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出版事业进一步繁荣发展起来。

明代的北京翻译图书，除了刊印有西藏文大藏经——《番藏》外，突出的特点是由于西方传教士相继来到北京，为宣传教义，翻译出版了许多宗教书籍。同时一些中国的有识之士，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也与一些传教士一同翻译了许多西方科学技术书籍。这与明代后期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当时社会普遍要求进一步提高生产技术，发展生产力有密切关系。

明代的政府刻书机构很多，如国子监、礼部、都察院、钦天监、太医院、工部、兵部、司礼监等。但翻译刻书者不多，

仅有钦天监和司礼监经厂。前者翻译西方数学、天文等科学技术图书，后者中的番经厂只翻译西藏文佛经。这可能与汉族刚刚推翻了异族统治，排斥异族文化，树立新政权的权威有一定的关系。

据明吕毖《明朝宫室》记载：“经厂掌司四员或六七员，在经厂居住，只管一应经书印板及印成书籍，佛、道藏、番藏，皆佐理之。”明经厂分为汉经、番经和道经三厂。汉经厂与番经厂虽然同为佛教经典出版机构，但前者是汉地佛教，后者是西藏佛教，界限分明。由于西藏佛教在明代宫廷中颇有影响，因而藏文经书的出版受到重视。这主要是由于明代西藏与内地之间政治、经济联系紧密，交往频繁的结果。据《典故纪闻》记载：“天顺间，翰林院译写番字，俱于国子监选用监生习用，近年以来，官员军民匠作子弟，投托教师，私自习学”。可见当时藏族文化在内地已有影响，影响到宫廷，也引起了皇帝的兴趣。据《明武宗实录》记载，明武宗就“好习番语”，“佛经梵语无所不通晓”。

明代官方曾编纂了若干汉语与非汉语对译的辞书，总称《华夷译语》。在这类辞书中其他民族语言的读音就用汉语注音。明代的四夷馆、会同馆就编纂有《西番译语》等书，“西番”就是指西藏。

明初，出于对西藏地方统治者进行管理的需要，明政府对藏区采取了“多封众建，尚用僧徒”政策，对西藏各教派领袖人物分别予以封赐，使西藏各地方势力统一于明中央政府政权之下，对有封号的僧俗领袖人物确立了朝贡关系，准许他们定期朝贡。明政府为表示对边远地区的关怀，往往以优厚于原物数倍价值的金银、绸缎、茶叶回赐朝贡者。北京与西藏的人员、经济、文化交往甚为密切，汉藏图书的翻译出版也达到了一定的高潮。

十三世纪以前，藏文大藏经多以抄本形式流传。元代皇庆二年（1313年）至延祐七年（1320年）间，在江河杂布的主持下，搜集各地经、律、密咒校勘雕印，为藏文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经，称奈塘古版。其版式采取贝叶经笈形式，长方形散叶两面刊刻，每部（或几部）或数卷以夹板束为一笈。但板片及印本均无流传。藏文大藏经的内容分为甘珠尔、丹珠尔和松绷3大类。甘珠尔又名佛部，也称正藏，收入律、经和密咒3部分；丹珠尔又名祖部，也称续藏，收入赞颂、经释和咒释3部分；松绷即杂藏，收入藏、蒙佛教徒的有关著述。明永乐八年（1410年），明帝御制《藏经赞序》称：“念皇考妣生育之恩，劬劳莫报，乃遣使往西土取藏经之文，刊纸印施，以资荐扬之典，下界一切众黎，均沾无涯福泽”。所谓“西土取经”，就是到西藏取藏文经予以刊印。明代永乐八年在南京以元代第一部木刻本奈塘古版复刻了甘珠尔。印本大部用朱砂或云硃刷印，亦称赤字版。这就是所谓的永乐《番藏》，至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又据永乐本重刻《番藏》，并添刻42帙《续藏》。称为万历版《番藏》。计147函，150074页。虽为自西藏取经文予以刊印，但翻译校对的工作则是必不可少的，其详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此外，1987年故宫博物院曾发现了一部珍贵的明代藏汉对音的明代写经《各佛施食好事经》，反映了500余年前明宫廷的汉藏翻译硕果。此经为泥金写本，护经封板为象牙所制，并刻有清晰的明成化款识。以象牙作一部经书的夹板，上有精制的西藏佛教密宗图像，非皇家则不能。明代的象牙雕刻，在北京地区主要由皇家御用作坊果园厂制造，加之有造型奇特复杂的西藏密宗造像，则需要由藏族艺僧参与，可见此经为汉藏工匠共同制作的。这部经用磁青纸书写，每页长30.5厘米，宽11厘米。在长23.5厘米、宽6.5厘米的黑色字心内以泥金书

写经文。每面两行藏文、梵文，两行注音汉字。藏文、梵文书写工整精细，汉字楷书端庄秀丽。^②

明代在永乐五年（1407年）设有四夷馆，主要负责翻译外国朝贡者的呈表和接待中的口译工作，先是从国子监中招生，后来兼选官民子弟，也有个别人通过这条渠道获得进士出身。学成后的翻译人员一般是政府机构中的下层文吏。^③

但在明代的四夷馆中没有设欧洲文字的翻译，在徐光启督领历局之前，也没有过官方组织的翻译西方图书的活动。而是在利玛窦入华以后，才逐渐形成传教士与士大夫相结合的翻译方式。

明末传教士和士大夫在华合译或分纂的西方科学技术图书约百余种。而在京刻书情况，李致忠先生在《明代的北京刻书》一文中有所概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意大利天主教士利玛窦来到北京。过了四年，就在北京创立了天主教堂，即人们所称的北京宣武门外的南堂，迄今仍是北京天主教的活动中心。南堂建立之后，葡萄牙、法国、德国的一些耶稣会士也先后来华，并刻苦攻读中文，翻译教内书籍，刊板印行，宣传教旨。如利玛窦的《天学实义》，南堂就前后刊印两次。据徐宗泽《耶稣会士著述目录》著录，南堂先后刊印过《圣经直解》等39种书籍。陈垣先生生前曾致力于天主教的研究，辑有《天主教著述目录》一稿，其中收录上起万历，下迄崇祯，教会刊印的书籍也是39种。而巴黎国民图书馆藏《基督教撰述刻板目录》载，刻于北京者多达124种（其中部分为清初北京刻书）。”^④

明初，由于朱元璋重视天象，因此首先召集了一批元时入华的西域学者，与中国学者一起，选择从元朝秘书监接受下来的秘藏回回文（阿拉伯文）书籍。在总数达数百册的书籍中，重点翻译他认为有用的天文、阴阳、历象方面的书籍。译成者